

紀念戴季陶老師

(本文插圖刊第10、43、44頁)

鄭秉世 (總統府資政)

啓迪教誨一生受用

戴傳賢季陶先生曾任國立中山大學的校長，我是中山大學的學生，所以稱他爲老師。民國十五年，季陶先生接長中山大學時，我已畢業，並由學校資送法國留學；校內設有海外部，經常輔導資送留學國外的同學，因此我常接到校長對我們學業及工作報告的指示，十分親切令人感動。

其實，季陶先生對我，不祇是校長和學生的關係，他對我的思想和做人處事，都有許多啓迪和教誨，我的一生，受他的教導和影響很大。無論名分和實質，他都是我真正的老師。

回憶過去我在重慶及南京服務期間，常利用星期假日訪候黨國先進，冀獲教益，季陶先生公館，是我比較常到的地方。記得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季陶先生南下廣州之前，我於一個週日，特地前往南京孝園拜候，他使人吩咐我在外客廳稍候。不久，他由一位常伴隨他的中醫生和一位隨從扶着出來，我即趨前道候，見他面部貼有膠布，深感不安。他要我跟他他在院中散步，絮絮說說近來身體和精神狀況，並垂詢各方動態，充分

流露憂國傷時之情。我們在院子裏或行或坐，盤桓了約一個多鐘頭。我曾就戴先生面部傷處，詢問那位醫生。據說：季陶先生身體極度衰弱，夜晚起來，在黑暗中摸索，被器物擦傷。我非常難過，乃建議請他前往臺灣休養，他不假思索的說：

「不必」，跟着追述在民國十六年八月，龍潭之役，京畿震動，他決心不離危城，結果轉危爲安。說話時，精神振奮，信念堅強，有凜然不可犯的神態。也許他誤會我怕此地危險，故勸他早日離開，其實我是擔心他的健康。我辭出後，內心仍極不安。乃將情況轉報蔣總裁介石先生，並電商廣東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先生，可否迎他赴粵小住。旋接宋主席覆電，極表歡迎，並飭粵省府駐京辦事處何主任樹祥面謁促駕。據我所知，他決意離京，雖想返四川原籍；但對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尤其對他會滲滄經營創設在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都有像故鄉一般濃厚的情感；於是在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偕同趙夫人乘美齡號專機，飛抵廣州。這次在南京孝園訪候季陶先生，是我陪侍親炙函丈時間最長的一次。迨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季陶先生在廣州東園逝世前，我雖協

同黨國先進爲其延醫救治，及逝世後爲其處理治喪各項事務工作，但對這一位經師和人師，未能報平日教導之恩於萬一，思之至爲傷痛。

最具聲光價值巨著

季陶先生對我思想的啓迪，遠在他接長中山大學以前。自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以來，季陶先生一直是革命理論的健將，也是青年的導師。我在民國十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之前和入黨之後，曾看過不少季陶先生的著述。深深受其影響。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下列五本書：

第一本是民國十四年六月完成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自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容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參加中國國民黨；共產黨從進國民黨以後，便在黨內從事分裂運動，擴張其CP（共產黨）和CY（共青團）的組織，曲解三民主義，陰謀篡奪國民黨和革命的領導權。尤其是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黨內更感危機重重。季陶先生因此南北奔走，高呼「互信不立，共信不生；共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生存。」並著「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

「一書，首先希望國人建立共信，即共同信仰三民主義以救中國。接着闡揚三民主義（他稱之為孫文主義，至有深意）的真義，以駁斥共產黨以唯物為出發點的謬論。此書就黨人思想上的糾正與貢獻至鉅，當時共產黨百般阻止此書出版，季陶先生仍毅然付梓，並隨即發行。俄共顧問鮑羅廷既恨且懼，壓迫政府下令撤版，並予嚴處。季陶先生後來被迫出走上海，而此書更流傳至莫斯科，很受蘇聯當局的重視和驚畏。我曾於民國十三年在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大禮堂親聆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讀了季陶先生孫文主義書以後，更啓發了我鑽研三民主義的志趣，後來寫了若干闡揚主義的文章，都是受了季陶先生思想上深刻的影響。

第二本是民國十四年七月季陶先生在上海閉戶從事反共理論研究後所寫成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黃季陸先生稱它為「著名的撕破臉公開向共產黨進攻的『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見黃季陸撰「懷念戴季陶先生」一文）。此書從國、共兩黨革命思想的基本不同着眼，說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很坦白的指陳當時國民黨的危機和CP與CY的製造分裂，破壞團結，指斥共產黨的寄生政策，並強調欲圖中華民族的生存，必先力圖中國國民黨的生存，號召孫文主義的信徒團結起來，恢復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完成革命。此書一出，真如石破天驚，轟動一時，不僅喚醒許多革命同志的迷夢，也引起了共產黨徒的總攻擊。出版後國內翻印，散布的數目不下數十萬冊，並譯成幾國文字，莫斯科第

三國際視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唯一勁敵，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美籍中國歷史學者韋慕庭評「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為研究國共關係特別重要的著述。我記得這本書一出版，季陶先生便寄了一批給當時的中山大學校長鄒海濱先生，海濱先生拿了十本給我，要我負責分送有關同學。我拿回來當天晚上，便把它讀完，覺得其中所說，無不是真理和事實。有許多話大家都知道而不能說、不願說、不敢說；季陶先生却很痛快的都說出來，有些更是我自己心裏所想而說不出來的話，閱後真是感動不已。第二天我就拿去分贈同志，並到處宣揚。直到現在，對這本書所指出的國民革命的本質和國民黨的性質與任務，我還覺得是值得國民黨同志注意和體會的。

以上兩本書是在季陶先生最具聲光、最有價值的，以闡揚國父思想為標的，而實際上却是建立國民黨反共理論的著作。在此，我願引述蔣君章先生所撰「戴季陶先生的生平與著述」一文中所說的話，內云：「先生這兩本書是民國十四年發表的，距今已在五十年以上（按此係指該文發表的日期計算，現在應該說是在六十年以上），雖然時異勢遷，但在今天看來，解決中國共產黨問題，依然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問題，也是解決亞洲問題和世界問題的根本問題。所不同的，是當時的中共是寄生在中國國民黨之內，借國民黨的名義來發展它的組織，分化和篡奪國民黨和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先生當日對共產主義邪惡思想的認識與駁斥，今天仍然是十分需要的；先生當日對真正三民主義信徒之堅強團結的號召

，對國民信奉三民主義的要求，今天也是十分需要的。今天，我們唯一的出路，是國民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的堅強團結，內防共黨分子的滲透顛覆，外圖反攻復國的完滿成功。所以戴先生這兩本書，我們仍然有細讀的必要」。他的見解，非常中肯，因此，我們稱譽季陶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反共理論的先知，當為世人所公認。

闡揚孫文主義哲學

第三本是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在上海出版的「青年之路」，此書為指導青年思想最有力、最有價值的一本書。季陶先生在十六年接眷到粵，預備久住，在中山大學有幾十次訓話，多與青年反省及救國自救之道有關，後來將講稿彙編成書，此書共分三篇二十章，第一篇是「過去的回顧」，計十五章，從歷史的發展與其個人黨務和政治經驗上，提示青年救國救世，立己立人的方向和道理。第二篇是「對於中山大學的希望」，計五章，其中有論及東方民族院和移民科的計畫，同時談到華僑教育問題。第三篇是「結論」，勸導全國青年勇猛精進，努力備戰救亡；並預測十年後，中國必受帝國主義的殘暴攻擊。此書出版後十年，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戰爭，被季陶先生不幸而言中。「青年之路」一書，我曾開閱讀多遍，所以對我思想的啓發，同樣有很大的影響。

第四本是民國十七年出版的「日本論」。季陶先生是日本問題專家；留學日本期間，與日人長久相處，真正瞭解日本民族，而且用心研究日本政治，對日本的認識，自然超越常人。其有關

日本的言論和著述，最初是民國八年所發表的「我的日本觀」一文，刊登於建設雜誌。對日本政策及領導人物，均作嚴格公正的評論，而對國人於日本問題的缺乏研究，和對日本的錯誤估計，提出坦率的指責。

民國十六年春，國民革命軍控制了長江流域，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為向日本朝野說明國民革命的目的，並盼能和日本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謀求兩國國民的親善，乃決議派季陶先生為代表，赴日訪問。

此行任務最重，歷時一個半月，對日朝野公開演說六十四次。由於日本顯武軍閥當政者不願見中國國民革命成功，欲將中國弄成四分五裂，以便從中漁利，遂致季陶先生的任務未能達成；但其言論豐采，周旋於壇站的氣概，仍為日本有識者所器重。

季陶先生此行對日本侵華的本質，有更深入的認識，回國復命，乃詳述戰禍之不可避免，惟有全國一致努力，才能救亡圖存；於是發表他有名的「日本論」。此書係由「我的日本觀」擴大改寫而成，除增多內容外，並提出若干新的看法。全文包括二十四節，從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談起，對於日本的文化、歷史、國體與國策的形成、人物性格的分析，都作徹頭徹尾的評論，字字踏實，切中肯綮。其中追述國父在民國二年訪日時，與桂太郎的政治談話，尤具價值。這本書我曾詳細閱讀，對我來說，是一本研究和瞭解日本問題啓蒙的書；在今日看來，它的價值還是不會磨滅的。

為中國合作社奠基

第五本是「協作社的效用」。這本書原是季陶先生在民國九年六月所寫的一篇文章，介紹合作制度（Cooperative System）和合作組織（Cooperation）的。當時這種制度和組織傳到中國不久，有人譯作合作制度和合作社（現已通用），但季陶先生認為「合作」不如「協作」之雅馴，便譯為協作制度與協作社，並特為文介紹。他認為這一種在歐洲發展的組織，雖有妥協性，但能排除資本主義的災害，也符合中國的古制和當前的需要，有許多效用，值得廣為提倡。跟着，他還親自起草了「產業協作社草案和理由書」，以利推行。後來，由中央宣傳部彙集了一本小冊，列為國民黨叢刊之五，仍以「協作社的效用」為名。我在廣州拜讀這本書之後，對這一合作制度和組織深感興趣，覺得很適合中國的需要，有意作進一步的研究。可惜當時國內有關的著述不多，難以深入。後來到了法國，季陶先生書中所曾介紹的法國老教授經濟學著名季特先生（Prof. Charles Gide），還在巴黎大學講課，我便去聽他的課，從事合作運動的研究。

民國二十年我回國以後，到各地考察鄉村建設，也特別注意當時鄉平和定縣的合作事業，並親赴該地區訪問，與梁漱溟、晏陽初兩先生暢談鄉村建設及有關推行合作運動的意見。後來我曾在中山大學法學院講授「合作論」，並著「合作教育的研究」一書。我雖然沒有從事合作運動和合作事業的實際工作，但直到現在，對合作運動

還深感興趣，認為國父在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中，以合作事業為地方自治團體事業之一；以及國民黨在定都南京後，又以合作運動為七大運動之一，都有其理由。凡此研究都足證我受到季陶先生這一小冊的影響之大。

季陶先生待人非常親切，有問必答，而且不厭其詳，這種誨人不倦的精神，真使人有如沐春風之感。例如民國三十三年我在重慶三民主義青年團任宣傳處長，建議中央發動徵印三民主義一百萬冊運動，為了查明三民主義的印行經過和其原始版本，便分向黨國先進請教；季陶先生會親筆寫了一封很詳細的信，給我許多寶貴的指示。又如民國三十六年，我奉中央指派赴印度擔任泛亞細亞會議（後譯為亞洲關係會議）代表團團長，行前向季陶先生請教，他也很懇切的給我許多鼓勵和指示，使我們不辱使命。這些事在我所著「景光集」中，已有詳細的敘述，不再重複。

今值季陶先生百年冥誕的紀念，我撰此文，側重回憶我在思想上領受到他偉大的啓示，使我在一生中作為鑽研主義和為黨國服務的指針。其實，在這時代中，受季陶先生思想所教化和啓迪者真不知有多少人，我不過是其中之一。尤其是他對國父思想的闡揚和反共的先知，更足為萬世之師，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效法的。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五〇八四二〇六。